

考古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在遗产核心价值阐释中的作用——以良渚博物院与良渚遗址公园为例¹

严建强 孙红芳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浙江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遗址是一个整体的历史信息源，其利用以考古介入为前提。遗址在考古过程中被分解为可移动的物品与不可移动的环境，分别由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进行管理。这一分离虽然会对整体理解遗产价值与意义带来损害，但如果博物馆与公园紧密配合，采取一体化的策略，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弥补，而且可以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深化对遗址遗产价值的阐释。遗址博物馆利用出土物与本体脱离所带来的自由，通过策划与设计，使物品以更适合传播、更易于理解的方式组合，使遗产意义得以更广泛、更系统与更深入地展开。遗址公园在本体的格局中展开，以现场体验与解读的方式，使观众在临场感中有更直接的体验和更真切的感受。

【关键词】：遗址博物馆 遗址公园 遗产核心价值阐释 良渚文化遗址 良渚博物院 良渚遗址 公园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考虑到全球范围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保护的严峻形势，1972年11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公约》”），旨在为集体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建立一个根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性的有效制度。到2022年，《公约》公布已经整整五十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对《公约》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

在中国，以公园形式保护文物可追溯到民国时期，而以公园形式保护大遗址则肇始于1955年的河南洛阳王城公园和1958年的陕西西安兴庆宫公园。《公约》的公布促进了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将圆明园遗址确立为遗址公园，1985年北京大兴建成了团河行宫遗址公园，此后又相继建成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和皇城根遗址公园。在此基础上，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开始启动。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12项。此后又陆续公布了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12项（2013年12月）和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12项（2017年12月）。经过多年努力，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对遗产保护、学术研究和历史知识公共化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公众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公园和河南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相继开放，通过遗址展示与博物馆阐释的配套，深入、系统地阐释了遗址的遗产价值，在社会上引起很好的反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遗产学者与保护专家也围绕考古遗址的保护、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建设以及考古遗址公园的未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这些实践与理论的探索有助于我们积累相关的经验，推动遗产学科的建设。笔者曾参与浙江良渚博物院与良渚遗址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在此以两者为例，探讨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在遗产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阐释中的责任与使命，以及两者间分工与协作的关系。

¹ **【收稿日期】** 2022-11-28

【作者简介】 严建强（1955—），男，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孙红芳（1983—），女，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馆学。

一、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遗址是一个相对完整与系统的信息源，是最具原生态、能真实反映历史生活的遗存形态。与普通的采集品、传世品相比，其包含的信息不仅容量大、主题集中，而且由于有明确的地点与文化层位，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更清晰的定位与更权威的实证力，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尤为珍贵的一手信息来源。考古遗址通常由构成其物理形态的不可移动部分与夹裹、镶嵌其间的可移动部分组成。两者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状态，具有互相印证、互相支持的作用，其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遗址具有重要意义的内涵。然而，在考古发掘前，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到这些内涵。所以，无论是出于保护遗址与文物的目的，还是为了对遗址意义与价值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通常都会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物理现象看，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就是将其可移动部分从不可移动部分分离与提取的过程，发掘完毕的遗址通常被分解成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的两个部分^[2]。从中国现行体制看，可移动部分入藏博物馆库房，由博物馆负责保藏与展示；遗址公园则负责保护、管理留在原地的不可移动部分。这只是具体分工不同，它们所履行的使命完全一致：从各自的特征与优势出发，共同承担起对遗址遗产价值与意义的阐释。要达此目标，形成共识，必要的前提是理解各自的特征，包括各自的优势与短板，还要理解两者之间的合作之道。

进入博物馆的可移动遗产主要出自聚落与墓葬两类不同的环境。从博物馆化理论看，两者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聚落遗址出土的物品如果没有被搬动干扰，会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当时的关系。例如，在良渚古城的池中寺发现了贮藏大量稻米的粮仓，它与莫角山宫殿以及河流、码头的关系被保留下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宫殿粮食供应和贮藏情况，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行政中心的用粮是由其他聚落生产并通过水运运达。然而，当这些物品进入博物馆库房时，博物馆化的代价就出现了：这些稻米与粮仓、河流、码头、宫殿共同构成的现实空间产生了分离，观众在博物馆中所看到的稻米因为失却了语境，成为一种孤立的物品，如果没有专门的说明就无法了解它们与别处发现的稻米的区别，也无从理解它们作为王权生存基础的重要意义以及当时已经出现的经济分工现象。相比之下，一些墓葬中出土的物品情形更为复杂，经历了两次身份转换。第一次发生在下葬时，这些物品与实际的使用场景分离，被置入设计好的特定空间中。如反山 M12 的玉琮与玉钺本应出现在祭祀或战争场景中，由于主人离世，它们从现实的使用状态转换为墓穴中的随葬静置状态。这种由实用品向随葬品身份的转换为它们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向我们传递了超越其本身的文化信息，不仅提示了墓主的身份，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是当时丧葬观念的表达。第二次身份转换发生在考古发掘中，它们从墓穴中被取出，进入博物馆库房和展厅，与墓地这个特定空间发生了分离，从随葬品转化为博物馆藏品和展品。博物馆化虽有利于物品的保护，但却是以失却语境为代价的，大大增加了观众理解的难度。比如，玉琮与玉钺两件玉器原先同处一穴，反映了祭祀权与战争指挥权具有一体化倾向，被掌握在同一人手中，体现出政教合一的政治特色。如果它们在展厅中各自处于单独的展柜中，缺乏对它们之间关系以及与当时政治背景的解释，观众就不可能理解它们在政教合一王权体系中的象征意义。所以，对这类经历了两次身份转变的展品必须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阐释。所有这些变化都提示我们，这些物品的博物馆化过程虽然是出于保护和研究的需要，但却是以丧失其存在的语境为代价。语境的丢失导致物品的意义变得难以理解，这是遗址可移动部分进入博物馆时无法绕过的难题与挑战。

不过，和其他物品的博物馆化相比，考古遗址出土物算是幸运的。在历史生活中，一件物品被收藏，它原先所处的历史语境可能被完全分离。随着岁月流逝，收藏品与原先的文化坐标及使用场景的关系完全中断，甚至无从考察。这一信源的信息量及其价值因此被削弱。遗址出土物由于是在考古发掘中出现分离，原先的关系却被考古日志很好地记录下来，尤其是考古地层三维可视化技术出现后，可以借助这一技术显示发掘过程，至少在影像中保存了两者的关系。

然而，进入博物馆的出土文物虽然丢失了语境，但也因为与遗址本体分离而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使得它们在阐释遗址的意义与价值时，可以按更有利于价值揭示与内涵理解的理想化方式来处理，从而使遗产意义与价值的阐释在广度、深度和高度方面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有效的平台。

镶嵌在遗址中的物品被固着在特定空间中，只能与遗址本体及周边的器物发生关系；作为博物馆的展品时，它被放置在哪个空间点、与其他物品保持怎样的关系都是策划人与设计师根据所设定的传播目的来安排的。由此，它所承担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都可能是多样的：在按先后发生的文明时序排列时，它成为历史叙事的一个环节；在按其出土的空间点进行放置时，它成为反映当时葬制的一个实证；在与其他文明的物品进行比较时，它又成为反映本地文明特色的样本。同时，它也可以被作为反

映当时工艺、审美或信仰的实证物。这一特征表明从遗址中独立出来的物品可以在阐释体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融入不同的叙事中，这就为遗址博物馆展览履行使命、实施特定的传播目的提供了更多多样化的可能性。策展人可以根据这一特征将它们组织成一个具有强大叙事力或说服力的阐释系统，从而使博物馆展览能更广泛、深入地阐释遗址文化意义，成为帮助公众理解遗址意义与价值的主要角色。

遗址的不可移动部分保留在原地，构成遗址公园的主体。它的存在方式本身就是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望、四至、朝向等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地关系、天人关系的理解与利用方式，散发出当时文化观念的气息。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的遗址所呈现的面貌体现的即为“发现时的原真性”，虽然与“使用时的原真性”有所区别，但仍以最接近生活原貌的方式呈现出最忠实于原生态结构的形态，也是我们理解遗址构造最理想的状态。但有时出于保护需要，一些重要的发掘点会实行回填，其物理结构不再显露，由此导致发现时原真性的消失，给观众理解其文化意义造成困难。

如果说博物馆展示的是失去语境的物品，那么，在以遗址本体为主体的遗址公园仅保留了物品被转移后的物理框架，也属于不完整的状态。这一物理框架虽然能反映空间坐标、环境的地形地貌以及各发掘点之间的空间关系，但由于失去了包含物，缺少两者间互相佐证、互相说明的扶持，对观众理解遗址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依然造成很大的障碍。如何减少博物馆化的分离行为对两者所带来的损伤，是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共同面临的挑战。不仅如此，两者还要通过密切而巧妙的分工与协作，利用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发挥“1+1>2”的作用。要达此目标，一些基本的方法应引起注意。

第一，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的建设应制定高度一体化的保护与阐释方案，确保它们在共同履行的使命中既各司其职，又互相呼应与补充，确保遗址价值能最大限度地被揭示、被传播。为此，两者各自发挥特长尤为关键。对博物馆来说，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相对自主的处理权，对出土器物根据研究成果和传播目的给予最有利于揭示主题和易于理解的安排，并由此将观众的理解导向更能反映其本质的深度；对遗址公园而言，利用自己原生态的优势为观众提供现场体验与解读，使观众对遗址所反映的生活形成感性印象。

第二，从认知的角度看，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在规划中的物理距离是一个会产生重要区别的因素。从理论上讲，分别处理可移动部分与不可移动部分的两个机构的距离越近，认知效果越好。因为观众在参观两个部分时相隔时间不长，原先的记忆较多地被保留，容易激发联想与比较，保证两者之间有良好的配合与呼应。然而，为保护遗址本体，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作了刚性规定，新增建筑必须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原则上讲，在符合国家规定、确切保障遗址本体安全的情况下，两者的距离越小越好。

第三，遗址博物馆与遗址公园的一体化还应取得视觉上的和谐。为此，遗址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与营建必须建立在充分理解遗址文化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在规模与形制上，必须适应与呼应出土文物的资源特点，为这些物品的展示提供理想的舞台；另一方面，建筑物的外观，包括色彩、调性、气质与形态，都应符合遗址所代表的文化性质，为观众理解展览内容提供一个具有文化暗示与联想的物理标识物。

二、良渚博物院的遗产核心价值阐释

良渚文化遗址是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史前文化遗址之一，具有多样化的文化内涵，包括突出的农业耕作效率、成熟的陶器制作工艺、令人叹为观止的治玉技术等。然而，遗产最引人注目的价值是它对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意义，被称为实证中国出现成熟文明的典型案例^[3]。在这个遗址中，有庞大的水利工程，有多重构造的城池，有最高权力的行政中心，有专属的粮仓、墓地和祭坛，有城区内的功能性分工。以此为良渚地区生活着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群，分布着等级与地位不同的聚落，有象征着权力高度集中的礼器与法器，也有高级别的陵墓。所有这些要素汇集一起，显示出一幅早期区域国家的画面，充分表明了这一文化已经跨进文明的行列。这些构成了遗址最核心的遗产价值，如何通过合理的分工协作，实现最有效的阐释与传播，是良渚博物院与良渚遗址公园建设的主要任务。

博物馆处理的是遗址的可移动部分。出土物品由于脱离本体空间而获得某种“自由”，使它们能够通过策划与设计，以理想化、有利于说明与理解的方式进行布局与陈列。这种自由带来的理想化首先体现在展览场所和空间的营建上。由于博物馆所处理的可移动部分已经脱离了原环境，不再受其限制，可以根据传播需求人为地设置新的空间。如何为遗址出土物的收藏、保护与展览量身定制理想的场所，是遗址博物馆建设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这一环节的质量直接影响博物馆展览的阐释与表达。按照最初的设计稿，良渚博物院建筑由一组宽 10 米的细长空间构成，其创意母题是“一把散落在山坡的玉锥”。这种长宽比或许适合玉器精品展，却不适合展出史前的聚落生活。为此，博物馆筹建方提出宽度不应低于 25 米的要求。设计师据此对建筑的长宽比作出了重大调整，最宽处达 34 米，以保证展厅有可满足还原聚落生活大型场景需要的宽敞空间。除内部功能外，博物馆的形制、色彩与肌理也很好契合了良渚文化的品质与性格。简约而规整的形制反映了良渚社会对规制和仪式的敏感性，加上色彩上接近鸡骨白的外立面材料，整个建筑让人联想到良渚玉器，也联想到良渚文化的特点。

允许追求理想化的自由这一理念更多地体现在展览本身的建设方面，表现为具体展品的放置与展品组合可以根据传播目的需要进行设计。为了有效说明某个主题或解答某个问题，博物馆展览可以将出土物品以一种不同于原先的空间方式呈现。这种针对问题而进行的理想化处理一方面可以使展览策划与设计系统化地进行时间的叙述和空间的整合，将相关的知识信息融入一个易于理解的体系；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观众用递进或比较的方式去观察一组物品，从而获得相关的结论。这种方式为更系统的历史叙事与更深入的价值揭示提供了可能性。

要履行彰显良渚文化反映中华五千年文明这一主题使命，与良渚文化的核心价值揭示最具相关性的无疑是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理论。我们知道，当代文明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复杂社会的形成以及权力高度集中是一个地区出现国家、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良渚遗址的考古材料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何通过物品的展示来说明当时已经进入早期区域国家，形成了中国最初的文明，是展览要贯彻的主要目标，由此就可以证明这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典型案例。正因为如此，展览策划与设计应着力突出复杂社会的形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两个文化特点。如果展览能有效说明这两点，展览的主要传播目的就得以实现，遗产的核心价值也就被准确揭示。

复杂社会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人群、聚落的分层，即它们各自都由三个及以上经济条件与政治地位不同的等级构成。良渚社会是平等自由人群的结合体，还是已经分裂成经济政治地位不同的层级？虽然良渚社会早已消失，但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墓葬依然存在，通过对墓葬规制与随葬物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这需要通过对不同墓群的比较才能实现，所以，在良渚博物院展厅中，我们不是简单地展示反山王陵，而是要将它与其他墓葬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选择若干处具有代表性的墓群，取其随葬品，分析其构成与数量（中位数），将它们并置在观众眼前。当观众在同一空间中看到不同的场景：有的墓坑中放置上百件精美物品；有的包含数十件随葬器，仅有几件陶器；有的墓葬完全没有墓坑，仅有手臂被反绑的骸骨。无须任何解读即能看出，这是一个由不同等级的居民构成的社会，观众对人群分层的概念一目了然。聚落的情况也是这样。良渚文化遗址面积达四十多平方千米，有经过规划的多重大型城池及作为行政中心的建筑群与粮仓，有祭祀的祭坛，还有复杂的水利系统。这一超大型遗址是大规模劳动的产物，是以集中的社会资源调度为前提。除了这一特大型遗址外，分布在上海青浦、江苏江阴等地的福泉山、高城墩等聚落，虽然也有高等级的墓葬，但在规模、公共工程及代表礼制的玉器配置方面远不如良渚，它们应属于地位在良渚之下的次中心聚落；还有大量如浙江余杭庙前、江苏吴江龙南等聚落，它们既没有高级别的墓葬，也没有出土精美的玉器，属于普通聚落。面对不同类型的比较，观众也同样可以得出良渚社会是由不同级别的聚落构成的这一结论。由此，“聚落分层”的概念也呼之欲出。当人群分层与聚落分层的实际展项被观察和理解后，“良渚是一个复杂社会”的认知自然而然地在观众的大脑中形成了。

展厅中作为展品的出土器物在离开遗址本体后是被允许采用多种技术方式进行辅助阐释的，这就为更系统、更深入地揭示遗产价值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反山 M12 出土的玉琮与玉钺如果简单地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虽然它们看起来比其他琮与钺体积更大、纹饰更精细，但观众依然无法真正领会其内蕴的意义。为了让观众理解，必须首先要说明古代国家的职能及国家权力的象征性标志物。博物馆传播最大的难点在于信息的隐蔽性与表达的非耗时性，尤其面对具有复杂且抽象的意义时，观众仅凭对静置展品的观察，难以实现真正的深层次理解。为此，良渚博物院采用了耗时性的数字化方式对玉琮上的神徽纹饰进行多层次的

深入讲解，借此将专家的研究成果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式，帮助观众理解。为此，展览先期介绍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国家功能，再介绍琮作为人神沟通的法器在祭祀中的地位，以及钺作为国家军事指挥权象征物在战争中的地位。当观众看到这两件分别代表国家主要功能的重器同出一个墓中，社会的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上的含义就显现出来。

除了复杂社会的形成与权力的高度集中外，莫角山王城的布局与构造及其与周边其他公共工程的关系，也是证明国家存在的重要依据。有专家分析建城所耗费的劳动力，若每年出工 30 万人，整个工程需要建造 110 年^[4]。刘斌等专家也指出，“整个城市系统的布局与山形水势充分契合，显示良渚先民在规划古城之时视野之广阔”^[5]。这种用工规模与城市规划通常与社会资源的调度能力有关，没有集中而有力的政治统治是无法做到的。古城内有工匠生活与工作的区域，莫角山上也有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宫殿及统治者专属的反山王陵区，不仅反映出社会分工与阶级差异，也说明当时存在着凌驾于一般社会之上的特权阶层，这些都是博物馆阐释遗产核心价值最重要的内容。在传统的、仅仅依赖实物展品的展览中，要说明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在今天的博物馆，展品不再局限于实物，遗址本身等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也可以通过模拟塑形成展品，包括反映遗址全貌的沙盘以及等比再现发掘现场的局部场景等。这种非实物展品的出现可以在超越实物的层次上解读遗址的内涵与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博物馆化造成的去语境的问题。例如，良渚博物院利用微缩的立体沙盘来反映王城的三重结构，采用情景再现技术重构性再现了宫殿建造的过程。

此外，良渚博物院还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对良渚文化的影响力进行对比性展示，加深观众的印象。例如，展览可以利用其他地区的相关藏品，如钱塘江南岸的河姆渡文化遗存、舟山海岛的良渚文化遗存以及四川金沙文化遗存、甘肃齐家文化遗存等进行比较。

这些都表明，遗址博物馆可以在一个量身定制的空间中，利用物品的布局与组合以及造型物、多媒体的帮助，对遗产核心价值进行更系统、完整与深入的阐释，从而扮演遗产价值阐释主场所的角色。

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遗产核心价值解读

遗址公园是在遗址本体上建设的，博物馆建设中的自由和理想化在这里并不存在，它必须在原先的空间格局与规定中展开。对遗址公园来说，对遗产价值的阐释无法追求博物馆式的系统和全面，但可以在本体全貌及重要发掘点的现场体验与解读中进行。这种现场感与在地性是遗址公园完成遗产价值阐释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其优势所在。为此，遗址公园建设的展示策略及其重点与博物馆并不一样，所选的案例也有所不同。

从良渚遗址公园所担负的遗产核心价值阐释的任务看，让观众观察与体验古城四至及三重结构所显示的规划性、分工和政治统治中心是理解当时出现早期区域国家形态的重要依据，也是遗址公园建设对遗产核心价值阐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良渚博物院曾制作了反映良渚古城的微缩模型对古城的三重结构作解读，但遗址公园的优势在于它能为观众提供原生态和真实尺度的空间与立面形态，这是博物馆所无法做到的。

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良渚遗址公园的建设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潮湿环境土遗址平地化倾向带来的平面形态漫漶、立面信息流失的问题。考古学家提出的城市结构与功能分区的概念难以在视觉上得到直接的支持。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早期人类生活遗址的几种类型。目前发现的古代遗址由不同的材质构成，并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比如，秘鲁的马丘比丘遗址（Machu Picchu）属石质遗址，由于石质材料具有很好的经久性，至今仍保留着丰富的立面信息。观众可以看到缓坡上成排的贵族居住区、智者们的红墙住宅以及王子住宅中的梯型房间，他们还可以看到主城堡中专门关押和惩戒犯人的监狱以及纪念陵墓上的雕刻。这些被观察到的视觉形象与生活痕迹为观众提供了无限的遐想，不仅具有智性的认知与理解，也有视觉本身带来的审美享受与历史感。

同样是土遗址，处在不同的自然环境，情况也大不一样。新疆交河故城土遗址长期处于干燥环境中，虽然具体细节在岁月的流逝中早已湮灭不见，但其基本的构架形态还是被保留下来，残存城址的沧桑感依然使人们的心灵深受震撼。

然而，站在长期处于多雨潮湿环境中的土遗址上，如良渚古城遗址，观众目光所及只有连绵的平地和低平的缓坡，曾经耸立的城墙与建筑完全不见踪影。这是因为原先营建高大结构的物质在长久的雨水冲刷下流至低谷，原先的低洼部分被这些物质逐渐填满，整个地形呈现出平地化趋势，使人类劳动与营建的成果重新回到荒原状态，大量立面信息随之流失，城市与建筑形态及生活氛围都消失不见。面对这种重返荒原状态的平地，观众难以想象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也无法形成像石质遗址、干燥环境土遗址所带来的视觉形象，从而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遗址价值的理解。这是当时良渚遗址公园建设的最大难点。

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观众意识到这里存在过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并且拥有政治统治中心的城市，是理解当时良渚社会已是早期区域国家最具说服力的支撑。然而，在平地化背景条件下要实现这一点极不容易。在保护遗址本体的要求下，遗址公园建设所采取的“最小化干预”策略给策划设计者发挥的余地非常有限，不可能用大规模的物理性手段恢复原地貌和立体景观。这是遗址公园建设最大的挑战，也是工程在后续项目中逐渐深化的部分。第一期工程借助轻型小构造进行符号化说明，设置了不同等级的标识标牌为遗址提供导览，并采用造型、图文和多媒体等手段勾勒、还原和说明城门与城墙、河道与作坊、宫殿区、王族陵墓四大功能区块。这种符号化的抽象表达很难反映出原生立体景观的现实感和真实感，因此第二期建设继续就凸显古城王城气象和等级秩序的空间格局而努力。为了彰显城墙的位置与构造，在陆城门的位置上设立了体现入城仪式感和古城宏大规模的相关装置与雕塑，用人工标识的方法显现城门的结构、位置和尺度。为了让观众形成更具整体性和直观性的印象，还在莫角山上设置了一个微缩模型，帮助他们理解王城构造与分区。说明城市在社会统治中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让观众意识到城市中宫殿区的核心地位。因此，增设了移动考古车形态的观察点，动态模拟了莫角山宫殿区的营建过程，并在小莫角山采取了意念性造型手段强化其在精神层面的至尊地位。这一努力在第三期工程中继续强化，观景台西南角增设全景观察点，并配备两个虚拟望远镜，使观众得以通过对公园的整体观察来理解城市的构造与分区。通过三期工程的努力，虽然采用了多种方法为观众建立王城规模、形制与构造的整体印象，但所发挥的作用仍是有限的，是良渚遗址公园未来需要进一步提升的重点。

要强化功能分区的概念，除突出宫殿王陵之外，也需要将居民生活与生产状态表现出来。二期工程采用轻质材料，在不影响本体的情况下进行了建筑、作坊与居民生活区的重构性复原造型处理。为防止较大体量的物体遮蔽遗址本体景观，造型物采用了金属丝网材料，使遮蔽感大大降低。为突出作坊概念并提供体验平台，该区域还设置了若干可供操作的作坊。

遗址在遗产信息解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呈现遗址“发现时的原真性”，这是在观念和认知中恢复“使用中的原真性”的重要依据。然而，有时为妥善保护考古现场会采取回填的方式，使遗址物理构造完全被屏蔽。如果该发掘点对揭示主题具有关键性作用，认知需求与遗址回填的矛盾就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形下，遗址公园就要想方设法恢复遗址发现时的原真性。为了减少对遗址本体产生影响，良渚遗址公园原地点上采用增高的方式，再在其上重现反山王陵发掘后的原貌，尤其是构成王权叙事代表性案例的M12。为确保其经久性与可持续性，墓葬复原整体采用耐腐蚀的青铜材料。

除了恢复发现时的原真性外，这一复原区还引入多种解读系统，包括由符号与图像构成的信息版以及视频解读片，对遗址的核心价值进行多层次的阐释。

遗址公园通过对考古遗址重要材料及发掘现场的解读深化了观众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发现了当年修筑大莫角山宫殿的大木，为观众具体想象当时宫殿的规模及建造场景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这种想象对遗产的活化至关重要。考虑到原木需进行保护性处理，遗址公园采用3D打印忠实还原了大木作，同时还塑造了人们在营建中拖移大木的具体场景。

在距宫殿区不远的池中寺出土了大量被烧焦的稻谷，专家认为这里应是王室专供粮仓。研究表明，它们是由其他从事农耕的聚落生产，通过水路运达。这既反映了莫角山作为王室居住的行政中心，也反映了不同聚落与居民有各自的社会分工。这为区域性早期国家确已诞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同时也是一个能够为观众提供想象空间的材料，观众可以借此想象当时运粮贮粮的情景。在相关的解读中，观众获得这样的知识：王城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不生产粮食，粮食由其他聚落生产，由水路运往王城。

遗址公园尽力强化这些能突出反映国家与王权存在的材料，力图给观众形成相关的印象和理解。但在如此广大的遗址公园中，这些可视化的项目散落在各处，难以像博物馆那样得到集中和系统的表达。如何在最小化干预、最大化阐释的原则下，更最大限度地揭示遗产的核心价值，是遗址公园后续建设中必须更加深入思考的问题。

考古发掘带来的遗址博物馆化过程造成了观众认知与理解的障碍，但这不会从根本上妨碍遗址价值的阐释和公共化。重要的是，负责保护不可移动部分的遗址公园与负责保管可移动部分的遗址博物馆在建设中必须立足于一体化规划的基础，既明确分工又密切协作，各自发挥不同的特点与优势，以保障遗产价值阐释通过呼应与互补，得到更完整、更系统和更有深度的阐释。

1. 考古遺跡博物館と史跡公園の遺産の核心価値の解釈における役割—良渚博物院と良渚遺跡公園を例に（嚴建強孫紅芳）

要旨：遺跡は全体の歴史的情報源であり、その利用は考古学的介入を前提としている。遺跡は考古学的に動く物と動かない環境に分解され、遺跡博物館と史跡公園で管理されている。この分離は遺産の価値と意義の全体的な理解に損害を与えるが、もし博物館と公園が緊密に協力して、一体化した戦略を採れば、ある程度補うことができるだけでなく、それぞれの強みを発揮して遺跡の遺産の価値の解釈を深めることができる。遺跡博物館では、出土物が本体から離れていることで得られる自由を利用して、モノをより伝わりやすく、わかりやすく組み立て、遺産の意味をより広く、より体系的に、より深く展開していく企画と設計をしている。史跡公園は本体の間取りの中で展開して、現場で体験して解説する方式で、観客に臨場感の中でもっと直接的な体験ともっと切実な感じがあることをさせる。

キーワード：遺跡博物館史跡公園遺産核心価値解説良渚文化遺跡良渚博物院良渚遺跡公園

1. 「고고유적박물관과공원이유산의핵심가치해석에끼치는영향-양저박물관과양저유적공원을예로들어」(嚴建強, 孫紅芳)

제요: 유적은 고고학적 개입을 전제로 하는 전체적인 역사정보의 근원이다. 유적은 고고발굴과정중에 이동 가능한 물품과 이동 불가능한 환경으로 구분되어 유적박물관과 유적공원에서 각각 관리된다. 이러한 분리는 유산의 가치와 의미에 대한 전반적인 이해를 손상시킬 수 있지만 박물관과 공원이 긴밀히 협조하여 통합 정책을 취한다면 어느 정도 보완이 가능할 뿐만 아니라 각각의 장점을 살려 유적의 가치에 대해 심도 있는 해석을 이끌어 낼 수 있다. 유적박물관은 본체로부터 자유롭게 분리되는 점을 이용하여 출토품을 보다 적합한 소통 방식과 이해하기 쉬운 조정으로 기획하고 설계함으로써 유산의 의미를 보다 광범위하고 체계적으로 더 깊이 있게 보여 줄 수 있도록 한다. 유적공원은 본체의 구조 속에서 현장 체험과 해설 위주의 방식으로 관람객들에게 보다 직접적인 체험과 진솔한 느낌을 줄 수 있는 현장감을 제공한다.

핵심어: 유적박물관, 유적공원, 유산의 핵심가치에 대한 해석, 良渚문화유적, 양저박물관과양, 양저유적지공원

参考文献

[1] 2022年9月下旬,为纪念《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签订五十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系列活动,在浙江良渚遗址公园召开了主题为“考古遗址的未来与发展”的学术研讨会。本文由此次会议的主旨报告扩充形成。

[2] 这是指一般的情形。像西安兵马俑和洛阳大型车马陪葬坑,文物是放置在现场中展览的。

[3] 良渚古城发现后,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说“现在可以证明良渚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参见刘斌《“探源中华文明 砥砺民族之魂” 坚守田野、求真务实考古发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网,[EB/OL][2022-06-08][2023-01-18]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045419332513662&wfr=spider&for=pc>.

[4] 赵辉：《远古的王城——良渚的国家形态》，《杭州》2017 年第 16 期。

[5]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良渚：神王之国》，《中国文化遗产》2017 年第 3 期。